

李忠尚著

Xinmakesizhuyi

“新马克思主义”析要

Xiyao

D18%

“新马克思主义”析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马克思主义”析要

李忠尚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 经 销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9.625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6,000 册数：1—5,000

ISBN 7-300-00178-5 / A·7

书号：11011·99 定价：2.00元

DH192/08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概论 | 1 |
| 一、 “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西方马 克思学”的异同..... | 1 |
| 二、 “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理论框架..... | 7 |
| 三、 “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制造的 “两大学说对立” | 19 |
| 四、 “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 | 51 |
| 五、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 | 59 |
| | |
| 第二章 卢卡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 65 |
| 一、 卢卡奇的生平..... | 68 |
| 二、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 70 |
| 三、 卢卡奇“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和《关于社会存在 的本体论》 | 86 |
| 四、 关于卢卡奇的评价问题..... | 95 |
| | |
| 第三章 科尔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 | 101 |
| 一、 科尔施的生平 | 102 |
| 二、 科尔施早期的“实践社会主义”思想 | 103 |
| 三、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 113 |

| | |
|-------------------------------|------------|
| 四、科尔施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观” | 129 |
| 第四章 豪克海默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 144 |
| 一、豪克海默的早年生涯 | 145 |
| 二、豪克海默的早期“批判理论” | 150 |
| 三、豪克海默流亡时期的“批判理论” | 168 |
| 四、豪克海默后期的哲学思想 | 178 |
| 五、“批判理论”的今昔演变 | 184 |
| 第五章 阿道尔诺的“否定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 188 |
| 一、阿道尔诺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 | 190 |
| 二、阿道尔诺早期著作的哲学冥思 | 195 |
| 三、阿道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 | 202 |
| 四、阿道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 211 |
| 第六章 马尔库塞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223 |
| 一、马尔库塞的生平及其思想分期 | 224 |
| 二、马尔库塞早期的马克思观 | 234 |
| 三、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246 |
| 四、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 | 255 |
| 附录一：“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 268 |
| 附录二：参考书目 | 290 |
| 后记 | 304 |

第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 概论

在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以其“非正统”、“非党派”、“非政治意识形态”的面目和众多的著述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它原本是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对马列主义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异议而发起，但却是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并由一些西方学者按照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加以理论展开，而逐步形成为一股世界性思潮的。“新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和工潮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近十多年来，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瞩目和兴趣，成为人们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之一。

一、“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众所周知，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旗号下，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别出心裁的研究，形成了各种流派，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等等。对这些流派有的冠之以“马克思学”，有的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谓之“新马克思主义”。这些称谓之间有何异同，有何

区别与联系，人们常常感到把握不定。因此，对它们从概念上加以规定和区分就显得很有必要。

“马克思学”一词从构词上来考察，源出希腊语，即由 Marx（马克思）加上logos（学科）而构成Marxologie（马克思学）。法国学者吕贝尔于50年代在《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上首先使用了这一名词，继而在60年末、70年代初的欧美“马克思热”中流传开来。“马克思学”通常是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从纯学术观点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研究，所以有人又称之为“西方马克思学”。它具有浓厚的思辨性和非实践性。“马克思学”者们以“客观地”对待马克思来标榜自己，即把他作为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对待，声称要对马克思的生平著述和思想作出“非阶级性”的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在他们撰写的著作中颇具影响的，有联邦德国伊林·费彻尔写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67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1976年）、《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到福利国家》（1968年）、《共产主义——从马克思到毛泽东》（1969年）、《从马克思到苏维埃意识形态》（1956年）和美国的阿·古尔德纳、法国的吕贝尔等人的著作。“马克思学”者在人员构成上，既包括象费彻尔等稳健派，也包括一些较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

① 这里讲的“较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右翼人士。他们虽然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但基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至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总评价，那是应另外说明的。我认为，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们还是激烈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揭示了在表面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背后对人的压抑和奴役。因此，他们实际上超出了学术的圈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已超出了“马克思学”的范围。

后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对知识分子地位下降感到忧虑不安，有较强烈的改变资本主义某些弊端的愿望但又力不从心，故而想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足以支持自己主张的变革的武器和精神力量。此外，“马克思学”者中也有一批人是怀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的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人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御用学者。

“马克思学”学派在人员构成上的复杂性也导致它在学术思想上的多种多样，很难看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或总的画面。但我们透过这些庞杂的现象仍可辨别出“马克思学”的本质。它实际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马克思学”是西方学者在书斋里从事的“纯学术性”的马克思研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客观上毕竟使更多的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学”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把它统统说成是纯粹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未免简单化了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的明显区别，在于它是由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而兴起，继而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由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一书中使用，后来安德森专门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一书，于是逐渐在英、美等国流传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潮的标志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以戈德曼为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翼。“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学说（实际上指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转向哲学、文化和艺术。也就是说，把旨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书斋里和大学课堂上的哲学。这一点，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相同之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构筑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在政治上则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与列宁主义相异的政治组织原则。它不赞同列宁关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理论，主张走议会道路和选择自治形式。它特别注重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艺术是唯一能超越一切的力量，未来的希望正存在于文化艺术之中。它看重意识的力量，注重阶级意识和主观性范畴，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责马克思只顾全力分析“主观结构”——商品拜物教、异化和意识形态，而忽视分析“客观结构”——帝国主义和积累。从科尔施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命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是批判；而从卢卡奇起，则在解释哲学的作用时借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的论述，宣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内涵有一种乌托邦的解放精神。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断言关于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从而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那里去。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点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公开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渊源性。众所周知，卢卡奇首创和坚持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明显地继承了黑格尔乃

至整个德国唯心主义的思辨传统。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解释马克思学说的这一特点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如和以阿德勒为代表的、具有新康德主义倾向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因其上述各种特征既不包括西欧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诸如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以及后起的被西方称作系统论者的波兰的科拉科维斯基。“西方马克思主义”虽是这种意识形态概念，但它还是有一定的地域性和一定的政治内容上的限制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员构成上，既包括那些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曾按照列宁主义从事研究工作、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的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员及其拥护者，也包括那些表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社会出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自己特定内涵的专门术语。我认为，它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曾风行一时，但已开始走向衰落。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较“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的概念。“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就在于它要“重新发现”马克思和“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包括“马克思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包括一切非正统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想标新立异的人。在这些人中间，“信仰”马克思主义与否不是重要的标准。除西方学者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外，苏联学术界也采用了这个概

念。如苏联哲学博士别索诺夫1978年出版的《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一书，就认为用“新马克思主义”来表示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合适的”。

这里，主要想谈谈“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无疑，两者在主要内容、特征和基本理论观点上大体是共通的。它们都是旨在发现和设计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以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抗衡；都是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19世纪的理论，而以20世纪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自居。在革命观上，都是崇尚文化和意识革命，而不重视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在其理论宣言中，都是标榜自己为超阶级的、信奉人道主义的解放使者。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又都具有富于幻想的浪漫色彩，都希望建设一个无压迫、无奴役、人本身能全面发展的理性社会。正因为如此，一些文章、著作在介绍和评述“新马克思主义”时，也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以非正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分野的唯一标准，而不局限于具体的观点和立场。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而“新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还以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基点来研究、注释马克思主义。这样，“新马克思主义”就包容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无法收揽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文章在评介“新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只谈不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流派，而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内部派

别。但这绝不是说“新马克思主义”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区别，在于它无地域性的限制。它不仅包括西方学者（如“社会批判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包括东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研究；如卢卡奇、科尔施、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等。这样，它就超越了“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政治概念和地域性的限制，使它在事实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概括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可以囊括东方“非正统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它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的情况说明，它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有概括性，更符合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际。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发展及其理论框架

人们一般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初。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严重后果，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引起了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欧洲掀起了革命高潮，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在革命高潮中，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

和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也在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倡导和支持下应运而生。欧洲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18—1920年，在芬兰、德国巴伐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曾相继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或人民政权。接着又有1923年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的革命起义。这些革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们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同时也给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20年代初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苏联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也着手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内部开始了一场自发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探讨马克思学说的同时，开始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一些疑问和批评。譬如有的人就提出，西欧与俄国情况不同，工业发达，产业工人多，因而西欧的共产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其特殊性。最早以所谓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正名而实质上以“非正统派”的意见问世的著作，当属1923年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它们问世后，在西方迅速流传开来，掀起了所谓“反正统”的“新潮”，后来被西方学者奉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而在共产国际内部，则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到了30年代初期，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首次正式公诸于世，随之在西方又掀起研究马克思的热潮，一时声誉不

一，众说纷纭。当时，“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德曼、迈尔等人发表演说和文章，称这是“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①，宣布要据此重新发现和估价马克思。由于不久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攫取了政权，接着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研究也就束之高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而威信大增；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已不止在苏联一国而在欧亚许多国家中建立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的斗争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它冲破了资产阶级的禁区，进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界和大学课堂，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热潮。尽管这种研究出于不同的立场、观点，褒贬不一，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远的不说，与萨特所说的那个年代^②，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西方的“马克思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高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民主德国组织一批学者作了专门的考

①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载《社会批判理论思想》，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7页。

② 萨特曾回忆说：“1925年，当我20岁的时候，大学里不开始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大学生不敢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害怕被禁止参加考试。……〔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没有教材。……我们这一代人同前几代和后一代一样，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巴黎1960年版，第22页）

察，描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脍炙人口，千百万劳动人民学习他们的著作，用他的思想来教育青年，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科学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家关于改造世界的思想正在这里付诸实现，在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下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建立起来”。“看来令人奇怪的倒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是近年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著作的研究占据了不小的地盘”。在报纸文章、学术刊物以及广播和电视中，确实可以说无日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同时，年轻的工人、大中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团体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探讨他们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问题。大学生们要求，在大学也要开课讲授马克思。那些公开反共的教授们，现在自我标榜为‘马克思通’，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住房里的电视荧光屏上成套播映‘马克思述评’。大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总汇报》也想通过一系列的文章使它的读者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大厦’”^①。

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课程表上几乎都有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历史和工会等课程，而这些课程在某些地方是长期被忽视或属于被禁止之列的”。“左派学者的著作大量涌现……美国最大的左派出出版社——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已超过40万册”^②。而且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又大都是一些

① 罗·鲍埃尔曼等：《〈马克思学〉的贫困。——对伪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批判》，柏林1975年版，第1—3页。

② 理查森：《美国教室中的马克思主义》，载1982年1月25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此处参阅了《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的译文。

高等学府中有影响的教授、学者。

“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西方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对20年代初所谓的“非正统派”观点加以继承和展开，逐步形成其理论体系，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号召，影响着西方群众，一时名声大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科尔施、马尔库塞等就曾被激进派学生称为“精神领袖”，他们的著作被誉为当时大学生运动及工潮的“圣经”。到了70年代中期直至80年代，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它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如施密特、哈贝马斯等）虽力图高举“新马克思主义”大旗，但终因时过境迁，已无所作为了。因此，可以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以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自命不凡，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观点，但它在基本理论上的苍白无力，使它不可避免地濒临解体的命运。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上来考察，一般认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葛兰西参与编辑的《新秩序》和撰写的《狱中札记》奠定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新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代表了20世纪西方哲学新的一翼，虽被称作“革命哲学”，“未来真理”，但实际上是一种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带有混合色彩的人本主义哲学。从它所谓“新”的意义上来说，“新马克思主义”主张面向未来，声称要用“总体性的着眼点”来观察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也讲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但它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潮，它公开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客观上并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却在实际上脱离了社会革命实践。

践。因而它首先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其次，“新马克思主义”极力主张要建立一种“新的”、“独立的”、“科学的”和“能代表一切阶级”的理论。这样，“新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根本上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由此可见，“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本世纪初出现的、想重新发现和设计马克思并宣称要给马克思主义恢复哲学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

如上所述，“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的矛头首先是指向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些“正统派”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理解历史，但不能支配历史。“新马克思主义”猛烈抨击了考茨基和梅林等“正统派”对哲学所抱的“敌意”，但又把“正统派”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不仅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修正主义（如伯恩施坦等），都是非哲学的，因此都应加以批判。卢卡奇指责修正主义要科学社会主义而抛弃了哲学；科尔施则将“正统派”斥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科尔施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之间，起码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马克思主义同哲学（主要是学院派哲学）没有多少共同之点，哲学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犯下的过失。于是，科尔施提出要给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方向，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

科尔施要求破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所谓禁区。他指出：假如把这个学说看死了，也就等于剥夺了这个学说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理，就会使历